

彼岸

2019年第3期（总第3期）

| | |
|-----------------------|----|
| 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 2 |
| 美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上） | 9 |
| 美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下） | 13 |
|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上） | 16 |
|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下） | 20 |
| 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 24 |

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一） 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红色中国网每年夏季发布年度红色经济观察。年度红色经济观察是关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系列年度报告，每一年的年度报告分为若干篇，其目的是为了从世界体系、资本积累、阶级结构、能源生产和消费等角度把握当前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追踪几方面矛盾的发展，逐步识别和辨明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革命的条件，并为现实阶级斗争提供指南。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由红色经济观察组撰写。红色经济观察组认为，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上升为半外围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主要从事中低附加价值的出口制造业，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因而在中国以往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积累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产阶级以及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在形式上是雇佣劳动者的现代小资产阶级。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建立在对无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小资产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逐步壮大起来，并且正在开展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又造成了一部分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政治激进化的趋势。

随着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反剥削斗争的增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从世界市场上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若干主要商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加。一旦世界市场或者国际政治发生对中国资本主义不利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可能被迫面临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从而使得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随着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他们必然要求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不同，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不占有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没有条件一方面保证本国的资本家阶级获得相当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又满足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

历史上，这样的矛盾曾经在多个半外围国家造成了积累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可以预期，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矛盾也必然在不远的将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阶级矛盾激化以及社会革命的条件。与以往半外围国家的危机

不同，将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既不能在中国资本主义也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因此，未来的危机和革命将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准备条件。

表一根据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的数据比较了 1870 年至 2000 年间世界若干主要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的相对水平。

在表一的上半部分，所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按照 1990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都与“西方四大国”的加权平均水平做比较，以“西方四大国”加权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比如，中国在 187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是 23%，就是说中国在那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方四大国”加权平均水平的 23%。

这里，“西方四大国”指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自 1870 年以来一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要核心国家，也是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加权平均水平可以代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标准水平。

表一的下半部分，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按照他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水平分成几个组别。最高的是“核心上层”，包括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在 100% 以上的国家；其次是“核心下层”，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在 75% 至 99% 之间的国家；再次是“半外围上层”，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在 50% 至 74% 之间的国家；然后是“半外围下层”，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在 25% 至 49% 之间的国家；最后是“外围”，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在 25% 以下的国家。然后，分别计算各个组别中的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从表一的下半部分，可以大致总结出 1870 年至 2000 年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程中的几条统计规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国家可以分为三个结构性层次（核心、半外围、外围）。在表一中，核心上层和核心下层两组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最低时约为 10%（1950 年），最高时约为 16%（1913 年、1975 年）。也就是说，始终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

另一方面，外围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1870 年时为 58%，2000 年时达到了 77%。这说明，1870 年至 2000 年之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的趋势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半外围下层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1870 年时为 24%，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保持在 20% 左右，但是在 2000 年下降到只有 8%。

以上两个组别相加，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四大国”平均水平 50% 以下的国家，其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最低时为 81%（1913 年），最高时为 85%（2000 年），即占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

最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四大国”平均水平一半至四分之三之间的国家（半外围上层），可以视为处在半外围下层至核心之间的过渡带。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只有少数国家处于这一过渡带之中；能够从半外围下层上升入这一过渡带然后又进一步上升为核心国家的，则仅有日本等少数特例。处于这一过渡带的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最低时只有 2%（2000 年），最高时也不过 6%（1950 年）。

自 1870 年至 2000 年，中国一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1870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西方四大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至 1950 年下降到十七分之一，到 2000 年恢复到了七分之一。

表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870-2000 年

表的上半部分列举了世界若干主要国家的人均 GDP 指数（以西方四大国加权平均的人均 GDP 为 100%）；

表的下半部分列举了核心、半外围、外围分类的各个国家组别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 | 1870 年 | 1913 年 | 1950 年 | 1975 年 | 2000 年 |
|--------------|--------|--------|--------|--------|--------|
| 人均 GDP 指数： | | | | | |
| 美国 | 106% | 118% | 131% | 113% | 115% |
| 英国 | 139% | 109% | 95% | 82% | 82% |
| 法国 | 82% | 77% | 71% | 90% | 82% |
| 德国 | 80% | 81% | 53% | 84% | 76% |
| 意大利 | 65% | 57% | 48% | 75% | 76% |
| 西班牙 | 53% | 46% | 30% | 58% | 63% |
| 前苏联 | 41% | 33% | 39% | 43% | 18% |
| 波兰 | 41% | 39% | 33% | 40% | 29% |
| 土耳其 | 36% | 27% | 22% | 27% | 26% |
| 墨西哥 | 29% | 38% | 32% | 36% | 29% |
| 巴西 | 31% | 18% | 23% | 29% | 22% |
| 埃及 | 28% | 20% | 12% | 10% | 12% |
| 南非 | 37% | 36% | 35% | 30% | 16% |
| 澳大利亚 | 143% | 115% | 101% | 91% | 87% |
| 日本 | 32% | 31% | 26% | 79% | 83% |
| 中国 | 23% | 12% | 6% | 6% | 14% |
| 越南 | 22% | 16% | 9% | 5% | 7% |
| 印度尼西亚 | 25% | 19% | 11% | 10% | 13% |
| 印度 | 23% | 15% | 8% | 6% | 8% |
| 各组别占世界总人口比例： | | | | | |
| 核心上层 | 6% | 8% | 7% | 6% | 5% |
| 核心下层 | 7% | 8% | 3% | 10% | 8% |
| 半外围上层 | 5% | 3% | 6% | 4% | 2% |
| 半外围下层 | 24% | 20% | 20% | 18% | 8% |
| 外围 | 58% | 60% | 64% | 63% | 77% |

数据来源：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

历史上，世界资本主义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核心国家，而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则生活在外围国家。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地理大扩张中，以西北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步将美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的广大地区纳入自己的范围，并掠夺了大量财富。在全球征服的基础上，西北欧以及后来主要是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建立并巩固了对少数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的垄断，并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不平等交换。

所谓不平等交换，就是说，核心国家通过出口包含劳动较少的商品就可以交换到外围国家的包含大量劳动的商品。对于核心国家来说，这种不平等交换在经济上的实际意义是，核心国家得以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一方面使得核心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得以长期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又使得核心国家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谋求内部的阶级妥协，通过满足核心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对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来助长改良主义的发展并消除社会革命的隐患。

在历史上，核心国家往往是帝国主义国家，而外围国家则往往是核心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主要从事高度竞争性的、低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具体来说，一部分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价值的农业、采矿业，向核心、半外围国家供应各种热带农产品和原材料（如非洲大部分国家、东南亚诸国、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国）；另一部分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

通过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即外围国家剩余劳动的一大部分所生产的产品不是用于本地的消费和投资而是转移到了核心国家、用于核心国家的消费和投资。这种价值转移，使得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只能掌握有限的物质资源。这一方面限制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从而限制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因而外围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外围国家的财政攫取能力。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无力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正常秩序、也无力提供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许多外围国家甚至根本不存在统一、有效的中央政府。

半外围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向核心国家转移剩余劳动，但是在与外围国家的贸易中从外围国家攫取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来说，要弱于核心国家但是强于外围国家，有能力维持相对有效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因此，在历史上，每当核心国家因为利润率下降而发生积累危机的时候，半外围国家往往承担着作为核心国家资本转移目的地的职能，接替核心国家从事某些由于竞争加剧、垄断地位丧失、从高附加价值下降为中等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

目前，世界上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包括一些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例如主要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波斯湾沿岸诸国以及主要出口粮食的阿根廷。当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原材料

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接近甚至超过核心国家；但是当世界市场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低落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则可能在短时间内下跌到外围国家水平。

还有一些半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中等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例如重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和电子工业（这些工业在二十世纪中期曾经是核心国家的主要工业）。但是，半外围国家一般并不从事这些工业中附加价值最高的那部分研究开发和生产活动，并且高度依赖核心国家提供一些最关键的机床和部件。中国是这一类半外围国家的典型代表。此外，巴西、墨西哥等国则既从事中等附加价值的制造业又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重要出口国。

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要大大高于外围国家并且接近核心国家。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能力要显著超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生产者，也超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又不像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掌握充足的、可用于维持内部阶级妥协的物质资源。因此，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半外围国家便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种矛盾汇聚的地方，是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表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比较了 1990 年至 2017 年间世界若干主要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的相对水平。由于世界银行的数据与麦迪逊的数据在统计来源和方法上都有差别，两者不完全可比，但是表一和表二所说明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大致相同的。

在表二的上半部分，所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按照 2011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都与“西方四大国”的加权平均水平做比较，以“西方四大国”加权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

表二的下半部分，仍然是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按照他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水平分成几个组别。然后，分别计算各个组别中的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在 2010 年以前，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所计算的各个国家组别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与按照麦迪逊数据所计算的 1870 年至 2000 年间各个国家组别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比较，并没有根本的变化。1990 年至 2010 年间，核心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保持在 13-1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四大国”平均水平一半以下的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保持在 81-84%；其中，外围国家人口之和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70%；处于半外围下层和核心之间过渡带的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 2%至 4%之间。

但是，到了 2017 年，由于中国上升为一个半外围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人口分布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四大国”平均水平一半以下的国家的人口之和仍然占世界人口的 82%，但是，其中的外围国家人口之和已经减少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西方四大国”平均水平四分之一至一半之间的国家，其人口之和则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表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90-2017年

表的上半部分列举了世界若干主要国家的人均 GDP 指数（以西方四大国加权平均的人均 GDP 为 100%）；

表的下半部分列举了按照核心、半外围、外围分类的各个国家组别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7年 |
|--------------|-------|-------|-------|-------|
| 人均 GDP 指数: | | | | |
| 美国 | 110% | 111% | 110% | 110% |
| 英国 | 80% | 80% | 81% | 81% |
| 法国 | 88% | 84% | 82% | 79% |
| 德国 | 93% | 89% | 90% | 92% |
| 意大利 | 92% | 88% | 81% | 72% |
| 西班牙 | 70% | 72% | 73% | 70% |
| 俄罗斯联邦 | 61% | 34% | 52% | 50% |
| 波兰 | 30% | 36% | 49% | 55% |
| 土耳其 | 34% | 33% | 40% | 51% |
| 墨西哥 | 37% | 36% | 35% | 35% |
| 巴西 | 31% | 27% | 32% | 29% |
| 埃及 | 18% | 18% | 22% | 21% |
| 南非 | 29% | 23% | 27% | 25% |
| 澳大利亚 | 85% | 85% | 92% | 91% |
| 日本 | 90% | 82% | 80% | 79% |
| 中国 | 5% | 9% | 21% | 31% |
| 越南 | 4% | 6% | 10% | 13% |
| 印度尼西亚 | 14% | 14% | 19% | 23% |
| 印度 | 5% | 6% | 10% | 13% |
| 各组别占世界总人口比例: | | | | |
| 核心上层 | 5% | 6% | 6% | 5% |
| 核心下层 | 9% | 8% | 7% | 7% |
| 半外围上层 | 4% | 2% | 4% | 7% |
| 半外围下层 | 13% | 13% | 15% | 32% |
| 外围 | 68% | 71% | 68% | 50%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仍处于快速增长之中。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进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半外围下层与核心之间的过渡带。这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结构就可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历史上，处于半外围下层和核心之间过渡带的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 7%。由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一旦中国进入这一

过渡带，那么处于过渡带的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可能暴涨到四分之一左右。这样一种重大变化，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一种可能性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贫富分化）将继续起作用。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在进入半外围下层和核心之间的过渡带之前陷入危机，或者在进入过渡带以后不久，又滑落到与大多数半外围国家相当的地位。历史上的苏联、波兰、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南非等国都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危机。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可能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不再起作用。这样，一旦中国进入了半外围下层与核心之间的过渡带，就可能一方面大大地压缩现有核心国家所占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造成现有核心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大大地增加世界范围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从而加速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都可能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二） 美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上）

按照当期美元（市场汇率）计算，198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为 26%；1985 年，一度上升到 34%；1990 年，回落到 26%；1995 年，为 25%；2000 年，上升到 31%；2005 年，为 28%；2010 年，下降到 23%；2015 年，恢复到 24%。2017 年，按照当期美元计算，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24%，仍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按照 2011 年不变国际元（即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199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20%；1995 年，仍为 20%；2000 年，上升到 21%；2005 年，下降到 19%；2010 年，下降到 17%；2015 年，下降到 16%。2017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5%，排在中国之后，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深化”的贡献（即伴随着机械化、自动化而来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反映技术进步）。表一说明了 1980-2017 年各个时期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就业增长、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表一 实际 GDP、就业人数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
（美国经济，1980-2018 年）

| | 实际 GDP | 就业人数 | 资本深化贡献 | 全要素生产率 |
|-----------|--------|--------|--------|--------|
| 1980-1985 | 3.30% | 1.53% | 0.65% | 1.09% |
| 1985-1990 | 3.33% | 2.08% | 0.20% | 1.02% |
| 1990-1995 | 2.57% | 1.01% | 0.34% | 1.20% |
| 1995-2000 | 4.32% | 1.81% | 0.65% | 1.78% |
| 2000-2005 | 2.58% | 0.70% | 0.43% | 1.44% |
| 2005-2010 | 0.90% | -0.38% | 0.74% | 0.55% |
| 2010-2015 | 2.19% | 1.37% | 0.17% | 0.65% |
| 2013-2018 | 2.39% | 1.59% | 0.16% | 0.63% |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3%；九十年代后半期一度加速到 4.3%；在本世纪的最初五年放慢到了 2.6%。在经历了 2008-2009 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2013-2018 年，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2.4%。

按照新古典增长核算，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中大约一半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余则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中大约 40%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另有 40-50%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余则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2013-2018 年，美国经济增长中 67%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26%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仅占 7%。来自资本深化的贡献下降，反映了美国资本家近年来生产性投资意愿的低迷，以资本替代劳动为特点的自动化进程进展缓慢。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约 1.5%；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一度加速到 2.4%；在本世纪前五年仍然保持在 1.9%。2013-2018 年，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仅有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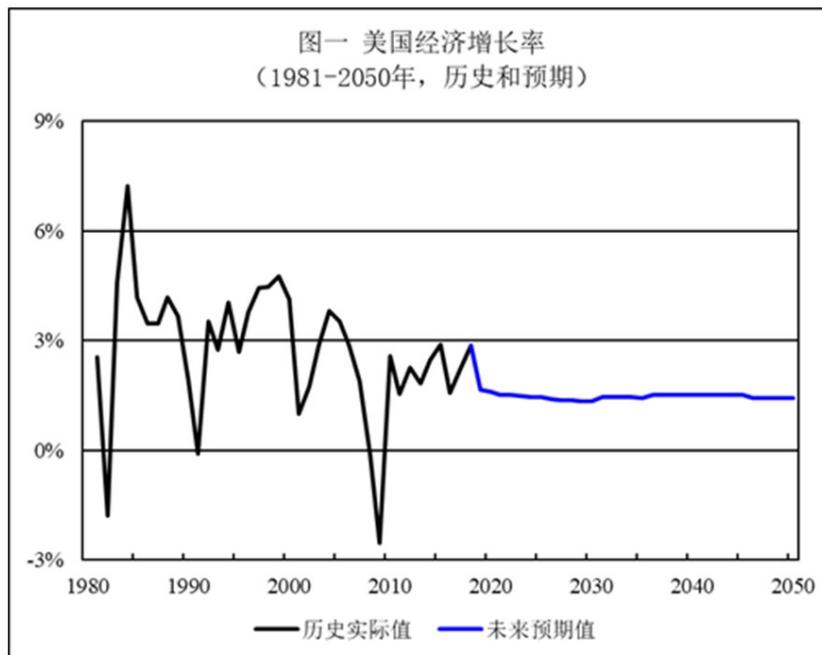
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往往在 1%以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一度加速到了 1.8%；在本世纪前五年仍然保持在 1.4%。2013-2018 年，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仅有 0.6%。与资产阶级媒体炒作的所谓当代技术“飞速发展”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经济统计，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在近年来显著放慢了。

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反动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借助新古典增长核算做一些统计分析。假设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每年增长 0.63%（与 2013-2018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同），假设美国的劳动力数量未来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同步（采用联合国对美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再假设美国经济维持其近年的投资率（设本年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3.2%）和折旧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本的折旧率为 8.7%），就可以推算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趋势增长率。

图一显示了美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实际增长率和按照上述核算方法及假设所预期的未来趋势增长率。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经历了两次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是 1980-1982 年危机（其中 1982 年经济负增长 1.8%），第二次即 2008-2009 年的“大衰退”（其中 2009 年经济负增长 2.5%）。此外，在 1991 年和 2001 年，美国经济分别经历了两次温和衰退（1991 年经济负增长 0.1%，2001 年经济低速增长 1.0%）。

按照上述假设，即按照美国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美国经济未来将缓慢增长。预期美国经济在 2020-203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为 1.43%，至 2030-2040 年将略微上升为 1.49%，至 2040-

2050 年回落到 1.47%。至 2050 年，预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 2011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 28.99 万亿国际元（2017 年为 17.7 万亿国际元）。至 2050 年，预计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 2011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 74123 国际元（2017 年为 54225 国际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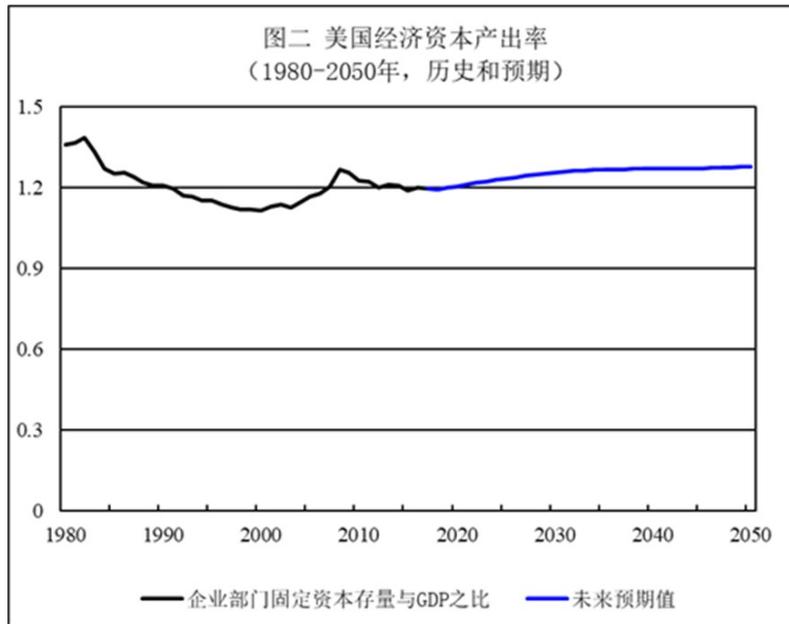


上述预期假设美国经济在未来会平稳增长，而不会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且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会继续。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text{利润率} = \text{利润总额} / \text{资本存量} = (\text{利润总额} / \text{国内生产总值}) / (\text{资本存量} / \text{国内生产总值}) = \text{利润份额} / \text{资本产出率}$$

如上述公式所说明的，利润率的下降可能来自于利润份额的下降，即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对资本家阶级不利的变化，从而工人阶级得以占有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个更大的份额，而资本家阶级获得的份额下降。利润率的下降也可能来自于资本产出率的上升。这里所说的资本产出率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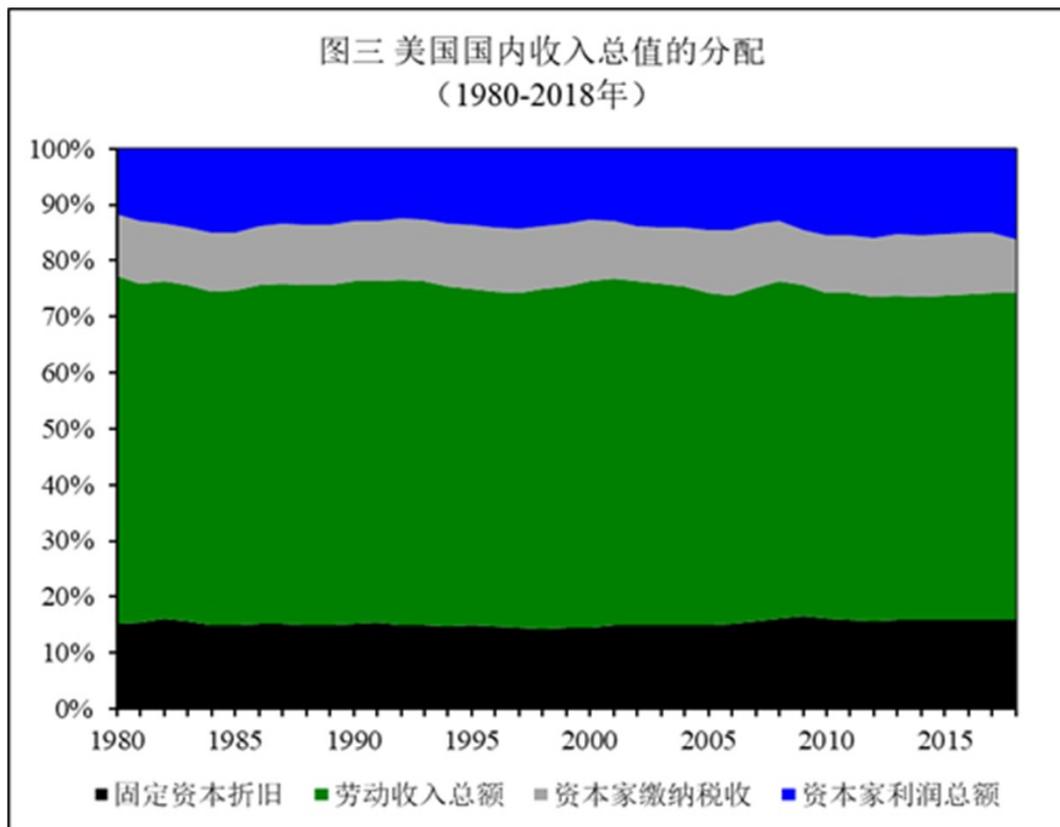
图二比较了美国经济在历史上和未来预期的资本产出率。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资本主义企业部分的资本存量才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追求利润。在图二中，用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代表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2017年，美国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按照上述假设的企业部门投资率、折旧率以及图一中所推算的未来经济增长率，预计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将在未来缓慢上升，于2050年达到1.28。



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三） 美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下）

利润份额是决定利润率的另外一个因素。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收入总值）可以分为劳动收入总额（包括雇员报酬和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资本家利润总额（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如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资本家缴纳税收（包括间接税减补贴、公司企业所得税和经过估算的资本家个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图三说明了 1980-2018 年美国国内收入总值的分配情况。2018 年，固定资本折旧占美国国内收入总值的 15.9%，劳动收入总额占 58.3%，资本家缴纳税收占 9.6%，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16.2%。由于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加紧剥削以及特朗普政府对资本家的减税政策，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达到了 1940 年以来的最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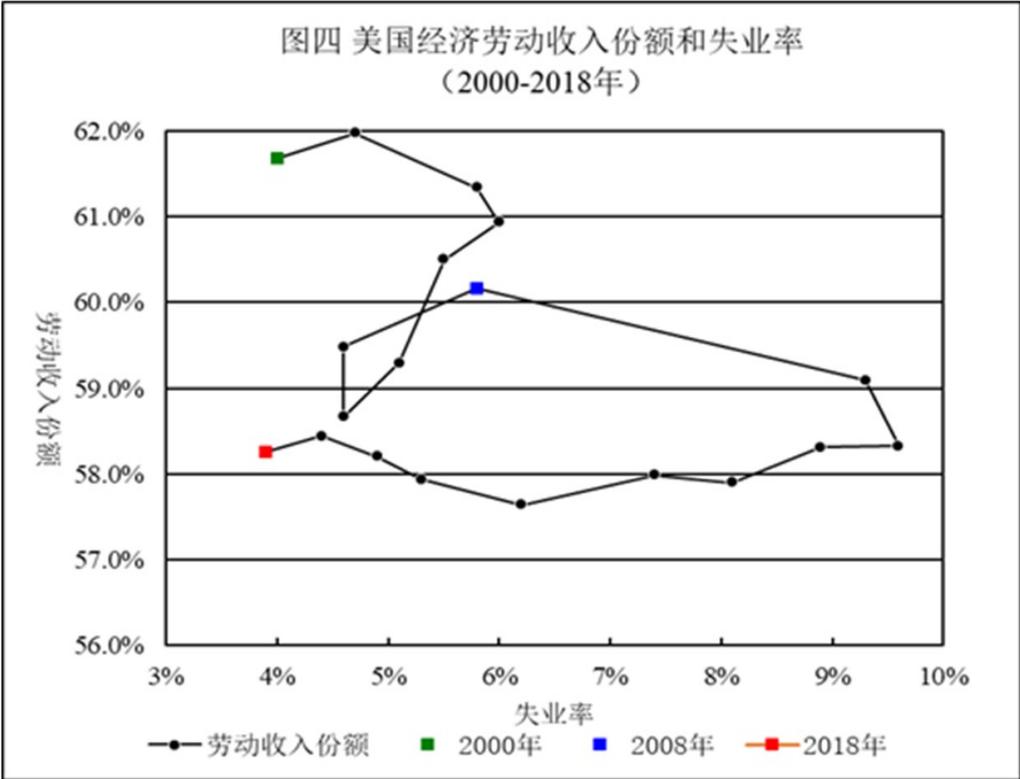


未来利润份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阶级力量对比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不利。但是，在每一个经济周期中，随着产业后备军大小的变化，工人阶级的斗争仍然会有起伏。一般来说，在经济扩张期，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人阶级的斗争会有所加强，并在经济周期的后

期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在经济衰退期，随着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会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下降。图四说明了 2000-2018 年美国历年经济失业率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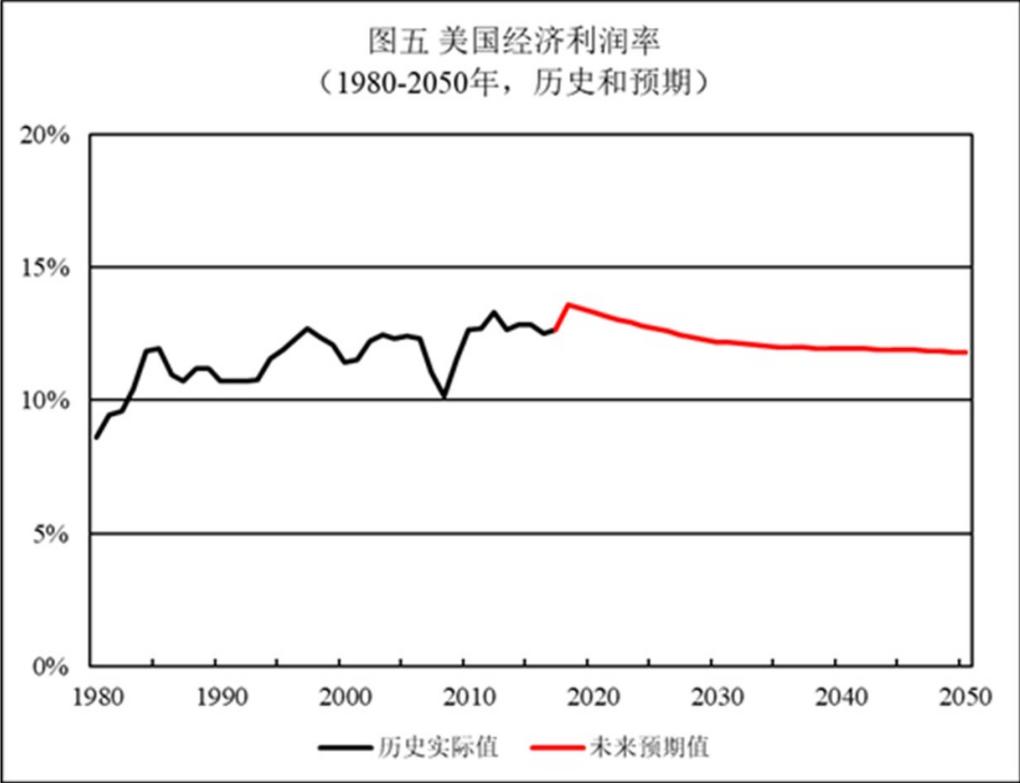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通常在 62%-63%；六十年代，一般为 61%-62%；1970 年，一度上升到 63.4%。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仍然在 60%上下波动；2001 年，还一度达到近 62%。在 2001-2006 年的经济扩张期中，美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跌，至 2006 年下跌到了 58.7%。只是在周期即将结束的 2007 年和 2008 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才有所恢复，于 2008 年上升到 60.2%。

此后，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失业率于 2010 年一度上升到 9.6%，劳动收入份额也持续、大幅度下降。2014 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了本次周期的最低点（57.6%）。2015-2017 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缓慢恢复，但是在 2018 年又有所下降。



在计算了资本产出率和利润份额以后，就可以据此计算利润率了。图五显示了美国经济在历史上实际的和未来预期的利润率。美国经济的利润率随着经济周期而发生变化。在 1980-1982 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中，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一度下跌到 10% 以下。1991 年，美国经济温和衰退，利润率大约为 11%。1997 年，美国经济处于经济繁荣期的顶峰，利润率达到 12.7%。2001 年，美国经济温和衰退，利润率下降到 11.5%。2003-2006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在 12%

以上。2008年是“大衰退”的第一年，利润率下跌到10%。初步估算，201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上升到了13.6%。这不仅是本次周期中的最高点，也是1966年以来的最高点。



按照以往经验，美国经济大约在利润率下降到11%时出现温和衰退，在利润率下降到10%以下时出现严重危机。如果假设美国经济未来的劳动收入总额和间接税减补贴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保持在2018年的水平，资本产出率按照图二推算的情景变化（见上一期红色经济观察），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与资本产出率同比例变化，美国经济未来的利润率将从现有水平缓慢变化并在2030年以后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就是说，从现有统计证据来看，虽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将在未来陷入长期停滞，但是尚没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迹象。

当然，资本主义矛盾的实际发展会比单纯的统计分析丰富和复杂得多。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工人阶级能否扭转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愈加不利的斗争形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约束能否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更加严重的限制。与此同时，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心正在从美国向中国转移。

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四）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上）

按照当期美元（市场汇率）计算，198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为 1.7%；1985 年，上升到 2.4%；1990 年，由于人民币贬值等原因下降到 1.6%；1995 年，增加到 2.4%；2000 年，上升到 3.6%；2005 年，上升到 4.8%；2010 年，上升到 9.2%；2015 年，进一步上升到近 15%。2017 年，按照当期美元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超过了 15%，排在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 2011 年不变国际元（即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199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3.7%；1995 年，上升到 5.9%；2000 年，上升到 7.4%；2005 年，上升到 9.8%；2010 年，上升到 14%；2015 年，上升到 17%。2017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8%，排在美国之前，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深化”的贡献（即伴随着机械化、自动化而来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反映技术进步）。表一说明了 1980-2018 年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就业增长、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表一 实际 GDP、就业人数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经济, 1980-2018 年)

| | 实际 GDP | 就业人数 | 资本深化贡献 | 全要素生产率 |
|-----------|--------|-------|--------|--------|
| 1980-1985 | 10.65% | 3.32% | 1.01% | 6.08% |
| 1985-1990 | 7.94% | 5.36% | 3.47% | -1.02% |
| 1990-1995 | 12.26% | 1.00% | 5.05% | 6.09% |
| 1995-2000 | 8.63% | 1.15% | 5.56% | 1.83% |
| 2000-2005 | 9.80% | 0.70% | 5.18% | 3.86% |
| 2005-2010 | 11.31% | 0.39% | 7.77% | 3.11% |
| 2010-2015 | 7.87% | 0.35% | 6.72% | 0.77% |
| 2013-2018 | 6.88% | 0.16% | 5.66% | 1.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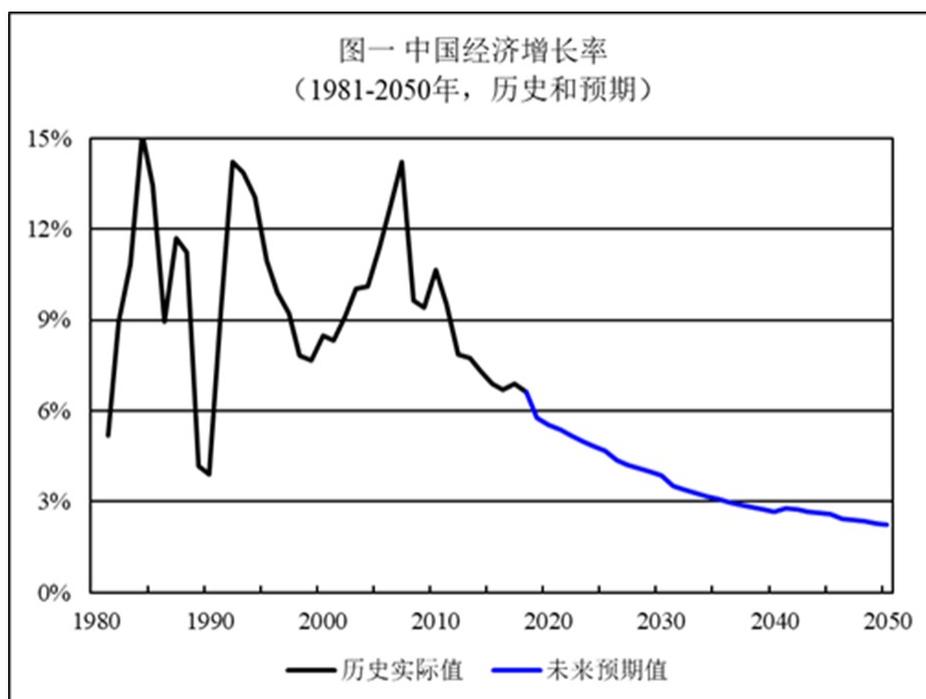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9.3%；九十年代加速到 10.4%；在本世纪的前十年达到了 10.6%。2010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慢。2010-2015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7.9%；2013-2018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6.9%。对于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率的可靠程度，在学术界一向存在争议。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若干学者合作的一篇学术论文认为，2008-2016 年期间，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与真实增长率相比平均高估 1.7 个百分点。本报告暂不介入相关的争议，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核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一半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大约四分之一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 10%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另有 40-60%来自于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 60%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2013-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82%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15%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就业人数增长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增长的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4.8%；到了九十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加速到了 9.3%；在本世纪前十年，进一步加速到 10%。2013-2018 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 6.7%。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一度跌入负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6.1%。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 3.1%-3.9%。2013-2018 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 1.1%。与资产阶级媒体炒作的所谓当代技术“飞速发展”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经济统计，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在近年来显著放慢了。

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反动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借助新古典增长核算做一些统计分析。假设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每年增长 1.05%（与 2008-2013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同），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未来与劳动年龄人口同步增长（采用联合国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再假设中国经济维持近年的平均投资率（设本年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1%）和折旧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为 5%），就可以推算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趋势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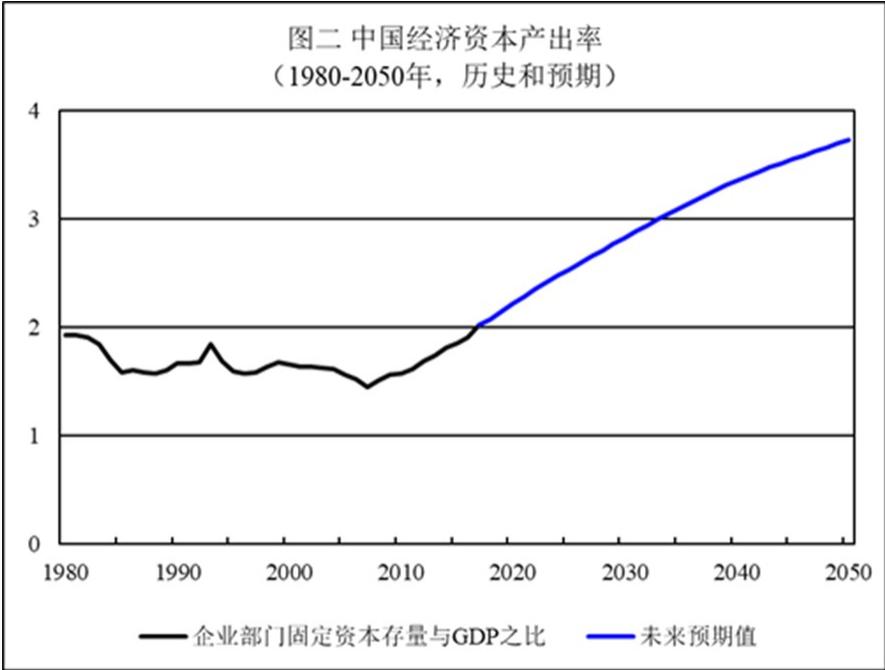


图一显示了中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实际增长率和按照上述核算方法及假设所预期的未来趋势增长率。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中国经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但是发生过几次增长低谷。一是在华国锋主导的“洋跃进”退却后的经济调整期，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约5%；二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重大政治动荡后，中国经济在1989-1990年每年增长约4%；三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大规模下岗最严重的1998-1999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不到8%；四是在经历了2010年的增长复苏以后，自2011年至2016年的增长率持续下滑。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7%的水平。

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将趋于逐步下降。预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将在2021-2030年下降到4.5%，至2031-2040年下降到3.1%，至2041-2050年再降为2.5%。至2050年，预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68.2万亿国际元（2017年为2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050年预期可以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至2050年，预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50844国际元（2017年为15309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94%，相当于美国2050年预期可以达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9%。

如果这些预期都变为现实，那么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国家，中国资产阶级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迷梦也就可以算是实现了。但是，这就等于假设无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还是世界资本

主义体系的结构矛盾都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不起作用，还要假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可以不受世界范围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约束。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正如以前的红色经济观察所说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取决于利润份额（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资本产出率（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之间的相互作用。利润率与利润份额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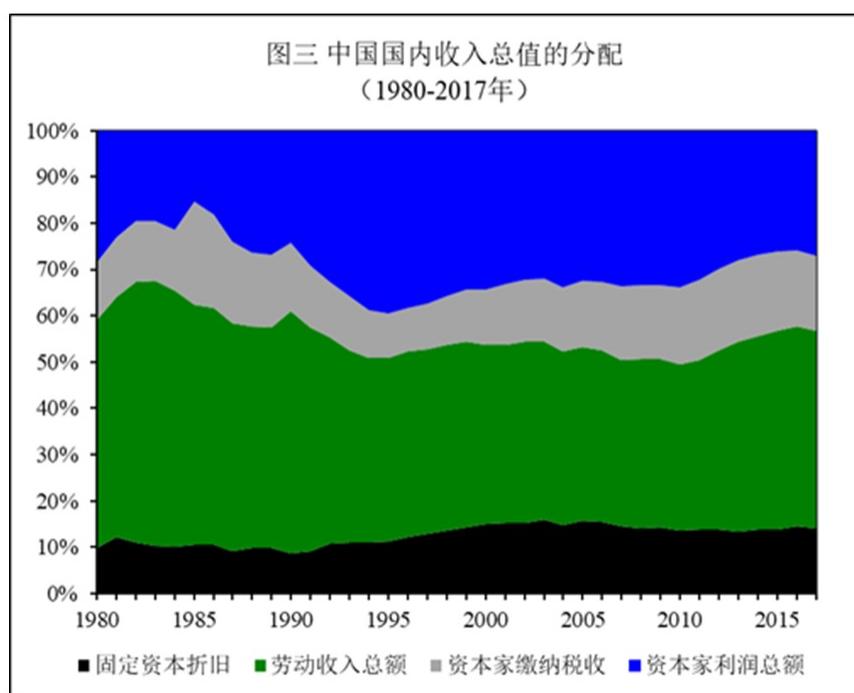
图二比较了中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和未来预期的资本产出率。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在1980-2007年趋于下降，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总的来说能够适应快速经济增长的需要，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但是，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至2017年上升到了2.02。按照现有趋势和上述假设，至205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将达到（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3.73。

中国经济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这将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个基本原因。

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五）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下）

利润份额是决定利润率的另外一个因素。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收入总值）可以分为劳动收入总额（包括雇员报酬和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资本家利润总额（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如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资本家缴纳税收（包括间接税减补贴、公司企业所得税和经过估算的资本家个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图三说明了 1980-2017 年中国国内收入总值的分配情况。2017 年，固定资本折旧占中国国内收入总值的 13.9%，劳动收入总额占 42.7%，资本家缴纳税收占 16.4%，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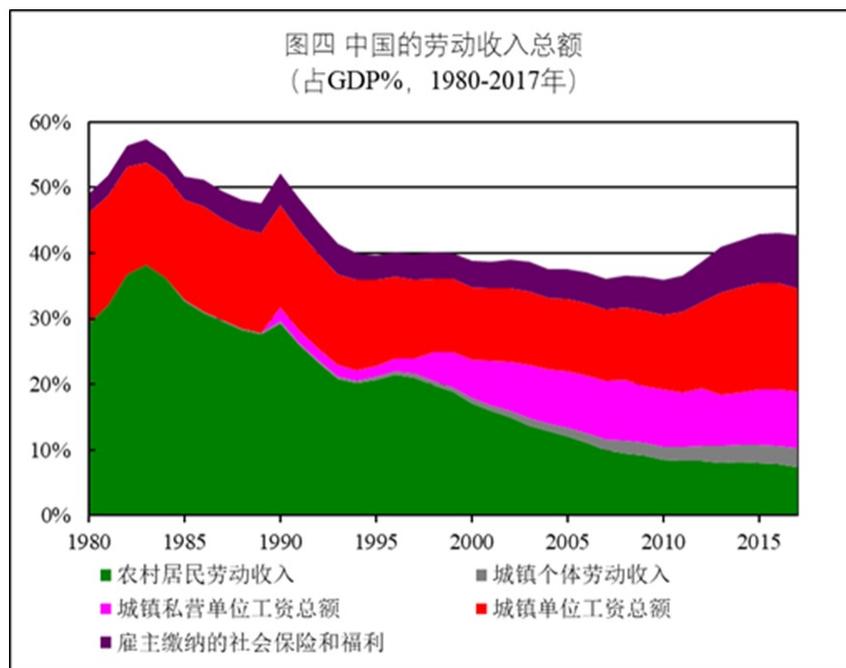


利润份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向快速扩张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 1983 年的 57.3% 下降到 2010 年的 35.8%。

但是，2010年以后，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增强，中国开始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至2015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42.9%；2016年，又略微上升至43.1%。

但是，2017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次发生下降，下跌到42.7%。2017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具体原因还有待分析。资产阶级当局对部分地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的镇压、所谓“供给侧”经济改革、部分“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工人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仅从统计上分析，2017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9%，名义劳动收入总额比上年增长9.8%。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名义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即整个经济范围的物价指数）是3.7%，而同一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1.6%。如果比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实际劳动收入总额增长率，那么前者是6.9%，后者是8.1%。所以，如果剔除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实际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仍然在趋于上升。

图四说明了1980-2017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组成成分的变化情况。



在计算了资本产出率和利润份额以后，就可以据此计算利润率了。图五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实际的和未来预期的利润率。在1992-2011年之间的二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保持在19%以上，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

一时期的利润率；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保持在 30% 以上，同样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一时期的利润份额。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数亿中国劳动者的残酷剥削。

但是，自 2007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利润份额有所下降。2007 年至 2016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从 23.3% 下降到 13.6%。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会很快爆发危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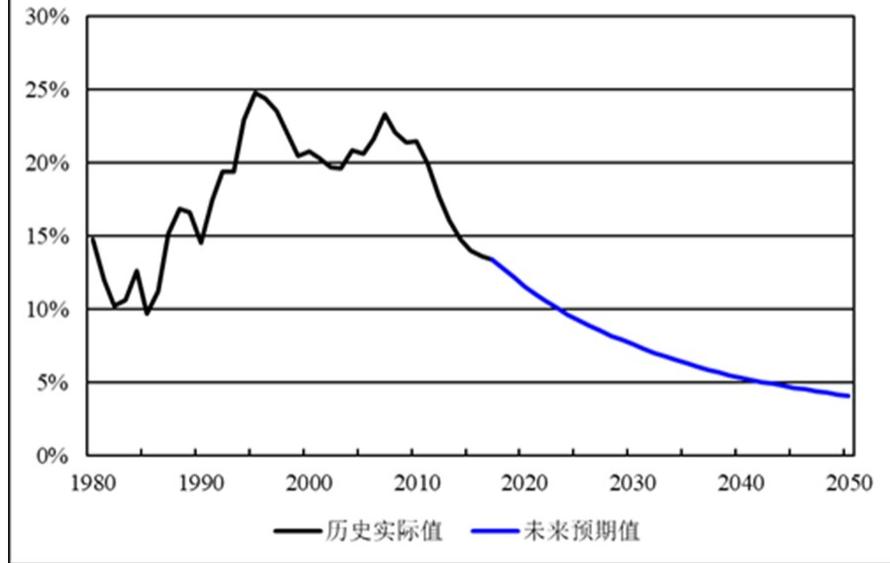
2017 年，由于利润份额上升，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速度有所放慢（当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为 13.4%）。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认为，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继续快速上升，而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发生对工人阶级不利的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继续趋于下降。

如果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劳动收入总额和间接税减补贴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保持在 2017 年的水平，资本产出率按照图二推算的情景变化（见上一期红色经济观察），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与资本产出率同比例变化，就可以推算中国经济从 2018 年至 2050 年的利润率。

综合中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当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 10% 以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根据美国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当利润率下降到 11% 时美国经济会出现温和衰退，当利润率下降到 10% 以下时美国经济会发生严重危机。从中国经济的历史看，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 10% 以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处于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最低水平。此前，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只有在 1982 年和 1985 年曾经一度接近 10%。1982 年，当时的修正主义集团刚刚上台不久，立足未稳。为了收买人心，当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当于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的大幅度收入转移。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和利润份额、利润率的下降。1985 年，当局实行“利改税”改革，将原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企业所得税，在统计上也表现为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一度下跌到 9.6%。

如图五所示，按照现有趋势和上述假设，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于 2020 年下降到 11.5%，于 2025 年下降到 9.2%，于 2030 年下降到 7.6%，于 2035 年下降到 6.3%，于 2040 年下降到 5.3%，于 2045 年下降到 4.6%，最后于 2050 年下降到 4.1%。

图五 中国经济利润率
(1980-2050年, 历史和预期)



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六）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和把握特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指南，明确革命的领导力量，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和次要对象，确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努力争取、团结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各种中间力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来攫取剩余价值。由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演变过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党-国”官僚的上层（这里的“党-国”指的是以“共产党”名义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者不仅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而且个人还往往通过对全民和集体财产巧取豪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无产阶级是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且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无产阶级一般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虽然不一定占绝对多数）。在半外围国家中，无产阶级一般是在城市部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

历史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中国仍有近半数的劳动者生活在农村（其中大约三分之二从事农业，另外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者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过去常常将农民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其农业收入几乎完全不能满足家庭的正常生活需要。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农民”家庭，没有一个或数个劳动力在城市或附近乡镇“打工”，充当雇佣劳动者。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雇佣劳动者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而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活动。所以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一般应视为半无产阶级。

类似的，在官方统计中认定为在城镇“个体”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生活状况与无产者相仿，甚至还不如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就业的无产者，应当视为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城市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也并非全部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除了需要大量的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以外，还需要一批为资本家服务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如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公务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教师、医生、律师、演员、体育

明星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特殊的技能，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大高于一般无产者，且对自身的劳动过程有一定的控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对于这些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给予他们的工资要显著高于一般的无产者，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样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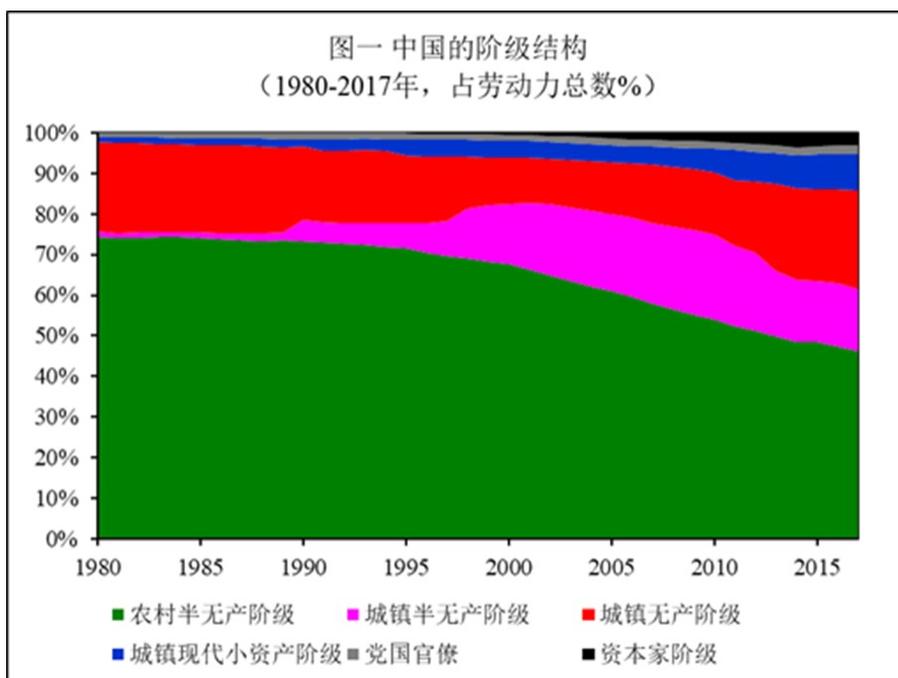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时期，现代小资产阶级一般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往往通过在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各种思潮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现象，与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直接从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大学教授、演员、体育明星）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与无产阶级相比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来关心各种政治问题有一定关系。

就中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叫“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集团（后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发动资本主义复辟、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同盟军。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是被民族国家分割的，这决定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相互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别。但是，由于现代小资产阶级掌握特殊的劳动技能，因而核心国家往往用较高的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这就造成了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的相对统一。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一部分现代小资产阶级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政治上崇尚所谓“自由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年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上升，这又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幻想，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寄希望于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繁荣中实现自己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是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幻想通过增加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善子女的社会地位，现有的小资产阶级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从而造成部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价格的贬值。不仅如此，大量小资产阶级在消费方面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幻想向资产阶级靠拢，又大大提高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为了维持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需要的成本（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子女上不起“精英”学校等）。这两种倾向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不断地面临无产阶级化的威胁或者在实际上下降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思想激进化，乃至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



图一显示了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在图一中，中国社会被分为六个阶级（或集团）。其中，农村半无产阶级包括除了乡村资本家以外的全部乡村就业人员（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和官方估计的乡村失业人员；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就业人员中不在“城镇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的所有人员以及官方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员；城镇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除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城镇资本家以外的其他全部就业人员。

在估算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时，我们以官方统计中的城镇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基础。

“党国官僚”指的是官方定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

1992年以前，在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资本家的数据。1992-2014年，“资本家阶级”包括官方定义的城镇私营企业投资者和乡村私营企业投资者。2014年以后，官方统计不再提供有关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报告的“雇主”在中国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来估算中国的资本家总数；由此而估算的资本家总数全部算做城镇资本家。自2015年起，不再估算农村资本家的数量。

如图一所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仍然带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外围国家的典型特征：农村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73-74%）。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阶级结构又表现出二十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城市部门中，几乎全部的劳动力都在社会主义的正式部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这体现在当时相对高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城镇无产阶级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绝大部分，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1-22%。城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规模很小，1990 年以前不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现代小资产阶级（当时贵为“知识分子”）和党国官僚在全社会劳动力中各占 1-2%。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原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残余相联系的城镇无产阶级被打垮。城镇正式部门就业大幅度萎缩，至 2000 年，城镇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了仅有 11%。另一方面，城镇非正式部门恶性膨胀，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在高度不稳定、没有保障、劳动时间超长、劳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接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城镇半无产阶级从 1990 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5% 暴涨到 2000 年的 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所扩张，至 2000 年达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4%。2000 年，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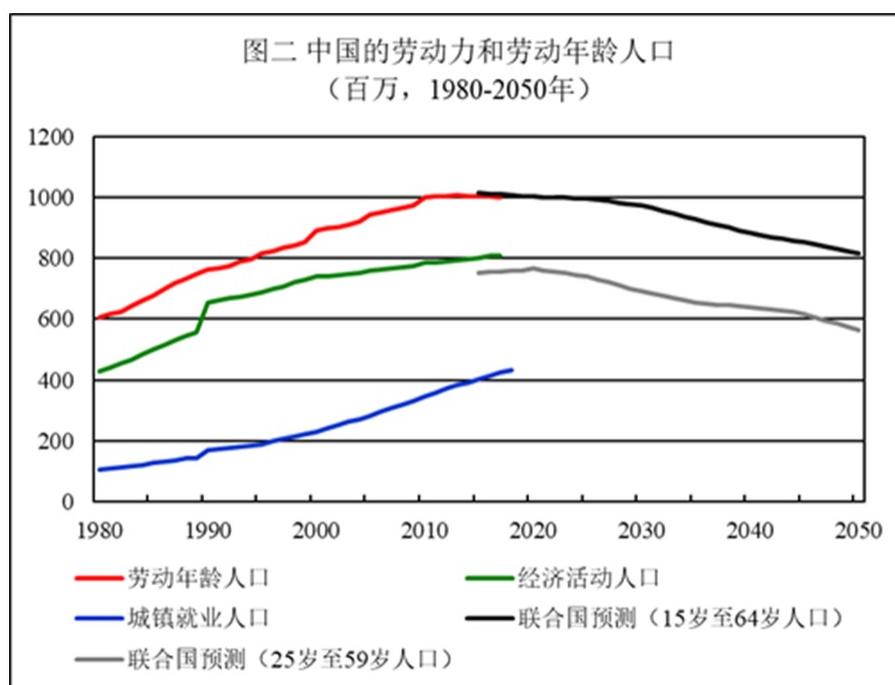
2000 年至 2010 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有所减少。至 2010 年，农村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 54%；城镇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 21%。城镇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恢复，至 2010 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了 6%；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总数增加到了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

2010 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首先，农村半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下降到了 50% 以下。2017 年，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总数减少到 3.73 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减少到 46%。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来自农村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主要动力，也是客观上资本家借以挑拨工农矛盾、逼迫城镇无产阶级接受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缩小，有助于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加强自己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在城市，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城镇无产阶级的队伍有所壮大，至 2017 年，城镇无产阶级的数量达到 1.94 亿，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增加到了 24%，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 46%。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至 2017 年达到 7200 万，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9%。另一方面，城镇半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缩小。2017 年，城镇半无产阶级的数量为 1.24 亿，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15%。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有所加强，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

2017年，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党国官僚总数为1700万，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世界银行所报告的中国资本家总数为2600万，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

以上是截至2017年中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阶级结构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必然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即无产阶级将成为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乃至成为绝大多数。目前，农村半无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但是，按照现有趋势，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城镇无产阶级所超过。



图二比较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劳动力总数（即“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和城镇就业人员。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超过10亿以后已经停止增长。由于劳动力参与率还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目前仍在缓慢增长，但是很快也将达到顶峰。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8.07亿。

按照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以后将开始加速下降，至2050年将下降到8.15亿。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25岁以下的大部分还要读书上学，60岁以上的由于年老体弱大部分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处于25岁至59岁之间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决定了劳动力总数的大致

规模。中国的 25 岁至 59 岁之间的人口将从 2020 年的 7.67 亿下降到 2030 年的 6.91 亿、2040 年的 6.41 亿和 2050 年的 5.63 亿。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于 2018 年达到了 4.34 亿，且仍在以每年大约 1000 万的速度上升。城镇就业人口与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之差大致可以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可以动员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几十年，这支剩余劳动力队伍将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减少，一方面由于城镇就业队伍的扩张而急剧萎缩。如果城镇就业队伍继续按照每年 1000 万的速度增加，那么，至 2030 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 5.5 亿，中国经济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将减少到 1.4 亿。至 2040 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 6.5 亿，超过那时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中国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将实际上全部消失。

上述变化，如果确实发生，将不仅意味着城镇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集中在城市且人数上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